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 增强党性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张 磊

摘要：1941年《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第一次把党性作为特殊问题提出来，但如何在全党范围普遍增强党性就成为当时党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尤其是整风运动期间抓住全党党性教育这个根本，直面突出问题，注重从思想方法上解决党性突出问题，在全党范围掀起了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党性教育运动。延安时期增强党性和整风运动的实践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也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继续增强党性提供了可借鉴的蓝本。

关键词：延安时期；增强党性；经验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1)03-0032-06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决定》第一次把党性问题作为特殊问题提出来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由此开启的整风运动使全党党员党性得到普遍增强，也为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做出了重大贡献。学习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增强党性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增强党员党性的自觉性，达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正确理解党性概念是增强党性的基础

增强党性首先必须对党性的概念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自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党性的概念一直没有进入党的视野，纷繁复杂的革命斗争使党无暇思考什么是党性，党员的党性到底是什么不很清楚。直到1936年毛泽东同

志才在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第一次接触关于党性的内容。张闻天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先后在党的会议和文章中使用了党性的概念。延安整风开始后毛泽东同志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上认识党性，他认为：“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1]不久刘少奇同志从理论上解答了党性的内涵：“党性，就是人们这种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2]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员党性的认识：“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3]这在理论上澄清人们对党性的模糊认识。党的领导人对党性的探索反映出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以及党所处的环境的变化党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解答有关党性的

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 20 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对党性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决定》中详细列举了当时党内存在违反党性倾向的具体表现，并且特别指出了在党内这些违反党性的表现虽不是一个普遍的危险，但在党的某些组织和某些党员身上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危险。这也成了当时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迫切需要增强党性的原因。1941 年 10 月到 12 月间，任弼时按照中央政治局要求作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也阐释了共产党员的党性是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的升华，党员的党性可以通过其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行来判断。1945 年 4 月到 6 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指出：“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4]

可以说，延安时期党内领导人率先垂范对党性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研究，对全党深入认识党性的概念及要求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在党中央领导人以上率下示范下，全党党员纷纷自觉按照党性标准检视自己、培养自己、提高自己，全党上下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受到了一次普遍的、深刻的党性教育和锻炼，端正了对党性的认识，纠正了背离党性的种种不良倾向，形成了优良党风政风文风，锻造了一大批党性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和随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党性概念及其要求的理解和把握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从开始认为组织性、纪律性强就是党性，到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等，这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性这一理论和实践问题探索的结晶。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理论探索不停歇。70 多年来，理论界对党性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多侧面的深入研究，使我们对党性的理解和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科学。而且，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积累，也确立了党性修养的基本内容以及新时代增强党性提升党性修养的途径。

二、敢于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增强党性的关键

（一）党的队伍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

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由此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党又面临着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形势。首先，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同志强调：“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5]因此，“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6]其次，新的严峻考验对党的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背景下，党内党员存在理论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北伐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经验等问题。因此，1937 年 8 月，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提出，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7]这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严峻考验面前通过党的建设和党性锻炼提升党员队伍战斗力这一重大问题。而此时，党员数量的大规模增加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队伍的整顿工作，“到 1938 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全国抗战爆发时的 4 万多人增加到 50 多万人”。^[8]当时许多党员身上还存在着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以及非无产阶级的思想。1942 年 2 月，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必须清除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要使全党的步调一致地为一个共同目标奋斗，就必须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1942 年 2 月毛泽东同志分别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开始。整顿三风“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9]

（二）接连发生的党内高级干部的政治事件使增强党性问题显得尤为必要

在当时党所面临长期残酷复杂斗争的形势下党内接连发生高级干部的政治事件使党中央思考应通过增强党性来建设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党。

在遵义会议上基本没有涉及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左”倾错误。“第二次王明路线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北方，对新四军，对上海都有影响。”^[10]长征结束后，1937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开始对长征中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总结，着重剖析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思想根源是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封建军阀的意识在党内的集中反映。1938年4月张国焘擅自出走并公然发表脱党声明，给党的形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对党中央的震动很大。

另外一起引起中央震动的事件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的悲剧在于“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11]更严重的是项英、袁国平很少向中央报告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可以说，过去三年中他们对党中央的不报告情况已发展到极不正常的程度。对此中央分析这一事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道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与军委的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失败。”^[12]最后会议提出在游击战争环境下，如果不重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那么今后党内仍可能会产生像张国焘或项英这样的人。

总之，从当时党面临主要斗争任务来看，中国共产党正处在与外来侵略者进行残酷斗争，与中国国民党再次合作为基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综复杂环境下，彼时中国共产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完全巩固。抗战以来党的队伍迅速扩大，但新党员成分十分复杂，而党又长期处在农村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之中，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使党内容易产生种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同时，张国焘分裂党叛党的政治事件、统一战线中出现的某些严重事件，还有一些地区、部门和高级干部存在的不服从中央、闹独立性等现象，提醒党必须保证自己的团结和统一。1941年3月，在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的情况下，党中央才有可能对增强党性问题进行专门的更为深入的研究与决策。

三、注重从思想方法上解决党性问题是增强党性的根本

从政党的起源来看，任何政党都是在一定阶级基础上产生的，以什么阶级为基础，就是什么阶级性质的政党。不同阶级性质的政党，具有不同的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基础和前提的。列宁在《对民粹主义社会学的批判》一文中指出：“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贯彻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3]因此，注重从思想方法上解决党性问题就抓住了党性问题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正是把党性问题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并从思想方法上认识和解决党性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那些反科学、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且如果党员没有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科学态度，那就是没有党性，或者党性不完全。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定》中指出：“要提倡……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14]1941年8月，党中央印发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作风上来认识党性：“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15]可以说，在这些报告、党内文件里用思想方法认识和解决党性问题，在当时党内产生了深刻反响。当时军事学院的党性检查材料里讲：“党员必须以唯物辩证的观点去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把握党的正确路线，真正成为党的路线执行者、实行家，因此要有‘实事求是’布尔什维克的坚强党性。”^[16]1943年3月，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一文记述他经过实践锻炼认识到粗枝大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风气，不是真正唯物论者的作风，那是唯心论者的特点。因而，当时从思想方法上

认识党性、增强党性在全党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自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增强党性的宝贵历史经验。

从思想方法上增强党性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党员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排斥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做到不但从组织上入党更要从思想上入党。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党内还存在许多党员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完全甚至完全没有入党的情况。毛泽东同志认为解决之道就在于在党内加强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教育与锻炼。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上认为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和改造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就是要同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同时，还要同党内以及自身存在的“个人主义、独立主义、英雄主义、分散主义、无组织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作斗争”。^[17]由于在延安时期党重视从党员思想意识上提升党性修养，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优良作风完整建立起来，党在政治上团结、思想上统一、组织上纯洁、行动上一致。

总之，总结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表明，党内的思想矛盾不能单纯靠组织处分和采取压服的方法，而必须注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必须要引导党员干部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坚定立场、辨别是非、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当前，党内依然存在着“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18]等违背党性的倾向，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世界观的问题。因此，从世界观的高度认识和解决党员的党性问题仍然是当前增强党性，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根本途径。

四、全党党性的普遍增强是事业前进的根本保证

从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历时近四年时间。“整风教育了中、青两代人，

教育了新、老两层干部。这是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培养实事求是精神的一次伟大胜利。”^[19]

从增强党性的角度来看，延安整风首先是从抓党性教育开启的。在延安整风运动启动前夕，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把主观主义作风作为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他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决定》则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认识上指出了违背党性的种种表现和六条纠正办法。在《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又把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作为党员党性强的起码态度。正是在整风伊始关于党性的宣传和教育的文章、文件，为全党党员自觉按党性要求锻炼自己指明了方向，也为延安整风顺利进行并取得全党空前团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7月，任弼时同志在中央党校作《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的报告时指出：“这个决定发出后，对这次的整风学习运动也起了思想上的准备作用。这个决定加上《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其他决定的发出，引起了全党对于思想问题的注意及思想方法的学习，展开了今天这样广大的全延安安全党的学习运动。《决定》这一文件，特别在整顿党风的学习中是有其特别重要意义的。”^[20]因此，全党普遍的党性教育、党员党性的提升是延安整风顺利推进的前提。

延安时期增强党性和延安整风的实践充分说明了增强党性是端正党风的前提和保证，端正党风必须从增强党性做起，这就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重要结论。任弼时同志总结到：“在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出后，事情比较好办了，许多事情比较统一，解决问题也比过去容易，不像过去那样困难了。这些都说明了同志们在学习《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后，思想上起了变化，有了进步。”^[21]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派性问题、山头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一是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讲党性不搞派性。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第四条的内容就是增强党性、根绝派性。可以说，这些都为当时党风好转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整党的决定》提出:“从一九八三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22]这次整顿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由于当时没有突出党性问题,虽然提出了抵制精神污染的任务,但没有从反对“和平演变”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党风问题,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蔓延,损害了党的形象,教训深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性问题,2015年12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强调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并明确党校的主课、主业就是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有很多关于党性教育、党性锻炼、坚强的党性等内容。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住党性教育这个根本,所以近年来党的建设成效显著:“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23]从延安整风到今天正在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所有经验教训都表明:只有从全党增强党性抓起,才能端正党风。

五、几点启示

(一)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认识增强党性,增强“四个意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党已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支重要力量,但党面临着长期残酷复杂的伟大斗争和艰难的伟大事业。这就要求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要求全体党员成为有组织的统一整体,要求共产党员摆正个人与全党、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些要求不是凭借党员的自发意识或是个别领导人的觉悟所能做到的,而是建立在阶级觉悟升华的基础上。共产党人的阶级觉悟之首要和集中的体现就是自觉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因此,我们必须紧密结合

党的政治路线讲党性,否则就是空洞抽象的。当前增强全党党性必须与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结合。尤其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这对每个共产党员的党性都是严峻的考验,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对党员党性的一次大考。因此,要增强党性须提高对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增强党性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党的基本理论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的。承担这些任务、应对这些挑战都迫切需要提升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如果不能旗帜鲜明讲政治,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站稳立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就不可能具有坚强的党性,不可能做到对党干净忠诚担当。任弼时同志在延安时期曾指出党员不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就不能提升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同时还要灵活地、联系实际地运用马列主义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同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 and 观点作坚决斗争。

(三)增强党性必须自觉加强世界观改造,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党性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党性的一条基本要求就是党员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阶级利益是党的最高利益,并且是出于觉悟性、主动性和积极性来为这个利益服务。这样的阶级觉悟、阶级意识是一个长期的强烈的斗争过程,必须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才能达到。任弼时同志曾指出:“不管我们的党员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成分如何,为了具备无产阶级的觉悟性,为了把握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首先得和自己的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斗争,战胜它,克服它,排斥它。只有这样,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容纳得下,才能站得稳,才能慢慢地变成自己属有的东西。”^[24]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然而“我

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还存在着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25]在这样严峻的执政环境面前,每个党员必须以高度的自觉性进行世界观的改造,这样才能树立牢固正确的世界观,增强党性,从而增强伟大斗争的本领。

不管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改革时期,增强党性都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课题。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取得显著成就是我们党抓住了全党党性教育这个根本,直面突出问题,从思想方法的高度解决党性问题。这都是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我国改革发展治理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历史机遇与风险考验并存,新冠肺炎疫情更增添了发展的不确定性。解决这些问题、化解这些矛盾,都需要党不断增强党性来应对。总之,在新时代增强党性依然是党的建设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0.
- [2][3]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224-225,224-225.
- [4]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17.
- [5][6][7][9]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92,394,361,426.
- [8]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244.
- [10]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11.
- [11][12][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1,33,174.
- [13] 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63.
- [1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47.

[16] 党性锻炼的标准[N].解放日报,1942-04-06.

[17][20][21][24] 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35,245,245,234.

[18]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2.

[19] 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368.

[22]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90.

[23]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25]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作者:张磊,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党史党建党性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毛军吉